

袈裟卷尽南海千重浪，贝叶传译东土万壑钟 ——论法显大师西行求法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释慧圆

(南海佛学院, 海南省三亚市, 572024; 19292772257@163.com)

摘要: 本文以法显大师西行求法为研究核心, 深入探讨其对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深远影响。东晋十六国时期, 佛教在中国发展迅速, 却受经律残缺、教义阐释分歧等问题制约。法显大师以65岁高龄踏上西行之路, 历经14年艰苦跋涉, 途经陆路与海路, 克服重重困难, 从印度带回大量梵文经律, 并将其翻译为汉文, 同时著有《佛国记》记录沿途见闻。他的贡献多维度地推动了佛教中国化。在宗教领域, 完善了佛教教义体系, 规范了僧团戒律, 为佛教宗派形成奠定理论基础; 在文化层面, 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 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影响广泛且深刻。在直接影响方面, 他推动了佛经翻译的本土化, 使佛教概念更易被中国文化接纳, 促进了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引发了佛教与儒道的对话, 推动了佛教伦理的本土化实践, 以及促进了佛教艺术的本土化创新发展。在间接影响上, 激发了后世如玄奘大师等僧侣们的西行求法热潮, 推动了佛教研究的发展; 促进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普及, 通过本土化的佛教故事传播和佛教节日习俗的形成, 使佛教融入民众日常生活; 其带回的佛教思想渗透到中国哲学中, 佛教艺术也为中国美学发展做出贡献。当前, 教界和学界对法显大师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 但在研究视角上, 对其在文化交流、社会心理变迁等方面的潜在影响挖掘尚存不足; 研究方法上, 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还不够充分。未来研究可从拓展研究视角方面进一步发展, 探究其对古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及在文化传承演变中的角色; 加强跨学科研究, 综合运用多学科资源; 挖掘新资料, 如出土文物、地方史志等方向深入, 以进一步揭示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为理解佛教中国化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 佛教中国化; 法显大师; 西行求法; 佛经翻译; 文化融合

引言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在华夏大地的传播发展过程中逐渐中国化,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漫长的中国化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东晋高僧法显大师(334~420)的西行求法之举, 无疑是其中关键的推动力量。在法显大师所处的时代, 中国正处于东晋十六国时期, 政治动荡, 战乱频繁, 但佛教却在这片土地上迅速发展。不过, 当时的佛教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尤其是经律的舛阙, 严重制约了佛教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化传播。法显大师的西行求法及其相关活动, 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宗教层面看, 他带回并翻译的大量经律, 为中国佛教教义体系的完善、戒律的规范以及宗派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文化角度而言, 其经历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历史和社会层面, 他的事迹见证了当时的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状况, 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深入研究法显大师西行求法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过程, 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 为当今文化交流与宗教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和宗教的互动关系提供独特的视角。本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案例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 以及总结归纳法。研究文献主要包括通过广泛收集和分析与法显大师相关的历史文献, 比如:《佛国记》(又名《高僧法显传》)、《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归元直指集》、《南朝佛寺志》、《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以及现代论文期刊等相关文献, 进而深入挖掘其西行求法的历史背景、求法过程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1. 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历史背景

1.1. 印度

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 自公元前6世纪由释迦牟尼佛(梵文Śākyamuni, 约公元前565~公元前486)创立后, 逐渐在印度次大陆生根发芽, 经历了长期的兴盛与广泛的传播。在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公元前187), 阿育王(梵文Aśoka, 公元前303~公元前232)大力推崇佛教, 使得佛教迅速在印度境内以及周边地区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 佛教在印度不断发展, 形成了众多的部派和不同的教义阐释。在法显大师所处时代之前, 佛教已经分化成为上座部和大众部等不同部派, 各自有其独特的教义和修行方法。不同部派在印度各地建立寺庙、成立僧团, 吸引了大量信众, 佛教在印度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成为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显大师西行求法之时，印度正处于笈多王朝时期（今印度北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约320~540），这一时期被视为印度佛教的黄金时代。笈多王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支持和保护的态度，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支持。这一时期，佛教在文学、艺术、建筑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和论著，这些作品不仅在教义阐释上更加深入系统，而且在文学表达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对后世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佛教论典《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俱舍论》；佛教诗歌《佛所行赞》、《美难陀传》；佛教戏剧《舍利佛传》；佛教故事《百喻经》等诸多著作。艺术领域，以佛教为主题的雕刻、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其中建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六世纪的阿旃陀石窟（古印度佛教艺术遗址），其中壁画大多画于笈多王朝，其精美的画面展现了佛教故事和印度社会生活场景，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此外，还有《马图拉佛陀立像》、《鹿野苑说法的佛陀》、《难陀出家》、《持莲花菩萨》等诸多著名作品。

建筑方面，众多宏伟的佛教寺庙和佛塔拔地而起，成为佛教信仰的重要象征和人们朝拜的圣地。在学术研究方面，印度的佛教寺院成为了学术中心，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和求法者。僧人们在寺院中潜心研究佛法，对佛教经典进行深入的探讨和阐释，推动了佛教教义的发展与传播。著名的那烂陀寺（梵文Nālandā Vihāra，今印度比哈尔邦）在这一时期成立，并在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佛教研究中心，吸引了包括玄奘大师（602~664）在内的众多外国僧人前来学习和交流。

1.2. 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界认为是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之间。据《中国佛教史》中记载：“西汉哀帝（公元前25~公元前1）元寿元年（公元前2），大月氏（梵文Tukhāra，今中亚、南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王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被视作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迹象。而东汉明帝（28~75）永平七年（64）的“永平求法”故事，更为人所熟知。传说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次日询问群臣，傅毅（约45~90）告知此为西方之佛。于是明帝派使者前往西域（今新疆及周边中亚部分地区）求法，使者在使臣大月氏遇到迦叶摩腾（梵文Kāśyapa Mātanga，~73）和竺法兰（梵文Dharmaratna），得佛像经卷而归，并在洛阳建立了白马寺。”[1]这一事件标志着佛教正式在中国内地传播。

初期，佛教的传播范围主要集中在洛阳等中原地区，且受众群体多为上层贵族与士大夫阶层。其教义的理解和阐释，常借助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比如：将佛教的“空”与道家的“无”相类比，将佛教的“涅槃”与道家的“无为”相类比等等。这种“格义”的方式虽有助于佛教在初期的传播，但也因其具有局限性，使得佛教教义在表达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言不尽意的现象。同时，由于早期传入的经典数量有限，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佛教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和政权更迭，使百姓生活困苦，精神上急需寻求慰藉，这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各政权统治者出于不同目的，对佛教采取了支持或利用的态度。例如，后赵的石勒（274~333）、石虎（295~349）尊崇佛图澄（232~348），大力扶持佛教发展，使得“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这一时期，佛教在教义研究、寺院建设和僧团发展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在教义研究上，般若学成为热门，形成了“六家七宗”。不同学派围绕般若思想展开深入探讨，推动了佛教义理的中国化进程。在寺院建设方面，大量寺庙在各地兴建。这些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还逐渐成为文化交流和社会救济的中心。僧团数量也不断壮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高僧大德，如道安大师（312~385）、慧远大师（334~416）等，他们在佛教教义阐释、僧团日常管理和佛法广泛弘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法显大师求法历程与所获成就

2.1. 求法历程

2.1.1. 陆路西行求法

法显大师的西行求法之旅，是一场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的伟大征程，其路线涵盖了陆路西行与海路东归，这一独特的行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东晋隆安三年（399），已过花甲之年的法显大师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毅然出发，踏上了陆路西行的艰难道路，同行者先后有慧景、道整、智严、宝云、慧简、慧达等共11人。他们首先穿越河西走廊（今甘肃省黄河以西），这一地区在当时处于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割据之下，局势动荡不安。据《出三藏记集·法显法师传》卷十五中记载，他们在途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如穿越沙河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饿鬼，遇之必死。”[2]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度的危险给他们的前行带来了巨大挑战。“越过沙河后，法显大师一行又面临着翻越葱岭的艰难考验。葱岭地势险要，气候恶劣，”[2]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艰难地前行。同行者中，四人殒命，但法显大师并未因此退缩，继续朝着心中的圣地前进。历经千辛万苦，于晋元兴三年（404），抵达印度。

2.1.2. 海上丝路东归

在印度期间，他四处游历，遍访佛教圣地，潜心学习梵文，寻求佛教经律。义熙五年（409），法显大师到达师子国（梵文Simhalaupā，今斯里兰卡国），两年后，海路东归。当时的航海技术尚不发达，海上航行充满了未知的风险。他乘坐的商船在途中遭遇了多次风暴，《高僧法显传》卷一中记载道：“得好信风，东下二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怖，命在须臾。”[3]商人们惊恐万分，纷纷采取各种措施以求自保。法显大师在这艰难的航程中，始终心

系佛经和佛像的安全，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及归命汉地众僧，展现出了坚定的信仰和无畏的勇气。在海上漂泊的过程中，法显大师所乘的船只还曾偏离航线，历经波折后，于义熙八年（412），才最终在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青岛崂山）南岸登陆，结束了长达14年的西行求法之旅。

2.2. 所获成就

2.2.1. 佛经收集

在天竺（今南亚次大陆统称）的巴连弗邑（梵文Pāṭaliputra，又称波宅厘、华氏城，笈多王朝首都，今印度巴特那地区附近），法显大师获得了《摩诃僧祇律》、《萨婆多众钞律》、《杂阿毗昙心论》、《方等般泥洹经》和《摩诃僧祇阿毗昙》等重要典籍。抵达师子国后，法显大师又成功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等梵本。法显大师收集的这些佛经，不仅数量丰富，更重要的是，它们大多是汉地此前未曾拥有的，有力地填补了中国佛教经典的空白。这些珍贵的典籍为中国佛教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推动了佛教教义的准确传播和深入研究，促使中国佛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走向成熟。

2.2.2. 翻译事业

南京是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出现宗教活动的城市之一。自东汉献帝末世（189~220），佛教文化流入南京，迄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法显大师与南京的因缘，深厚而殊胜。义熙八年（412），法显大师回国后，中国北方正处于混战状态，而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则是佛教发达，僧侣众多，梵刹林立，且佛教翻译事业昌盛。《南朝佛事志》中记载：“唐杜牧《江南春时》咏金陵诗云：‘十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盛况可知。”[4]法显大师被慧远大师派人接到了建康，在雨花台道场寺（毁于齐梁，未再复建）开始了讲学、译经事业。法显大师与佛陀跋陀罗尊者（梵文Buddhabhadra，359~429）等人合作，翻译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颇为可观，《出三藏记集》中记载有：“《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已入律录）、《僧祇比丘戒本》一卷（今缺）、《大般泥洹经》六卷、《方等泥洹经》二卷（今缺）、《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今缺）、《杂藏经》一卷。”[2]合计六部六十三卷，垂有百万余言。

2.2.3. 个人著作

法显大师根据自身西行求法经历，撰写了《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佛游天竺记传》等）。这部著作详细记录了他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再从海路归国，前后历14年之久，游历30余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书中不仅涵盖了各地的地理风貌、气候特点，还对当地的宗教文化、社会风俗、经济状况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载，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航海记录。从史学价值来看，《佛国记》堪称研究公元5世纪亚洲历史的珍贵宝藏。它为研究当时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格局、民族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在宗教价值层面，《佛国记》详细记载了法显大师在各地的求法经历以及所见到的佛教圣迹、宗教仪式和僧团生活等内容。这些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记录，为佛教中国化进程提供了实践依据和理论启发。《佛国记》还在文学领域展现出独特魅力。其文字简洁生动，叙事流畅自然，充满了感染力。比如：“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今山西省）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3]“法显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3]这样细腻的情感描写，令人不觉为之动容，感同身受。《佛国记》作为中国古代游记文学的早期典范之作，为后世的文学作品在叙事手法、情感表达以及异域文化描写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法显大师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3.1. 直接影响

3.1.1. 丰富三藏储备

东晋时期的佛教，三藏匮乏。从经藏来看，虽有不少经典被引入并翻译，但由于当时翻译方法、语言限制等因素，众多经典存在内容残缺、译文歧义等问题。当时流传的戒律典籍极为匮乏，仅有的几部译本大多是简略本或者某部完整戒律的部分内容。比如：三国时期昙摩（柯）迦罗译出的《僧祇戒祇心》，只是《摩诃僧祇律》的节要版本；西晋时期竺法护（228~306）所译的《比丘尼戒》，也只是说一切有戒律《十诵律》的一部分。道安大师曾经感慨：“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5]法显大师亦是：“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2]论藏的发展同样滞后，相关论著的翻译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对其中义理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难以满足佛教在义理探究和思想体系构建方面的需求，限制了佛教在中国的深度发展。

法显大师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怀着对佛法的坚定信念，尤其是对律藏的迫切渴求，在65岁高龄的时候，毅然踏上了西行求法的艰辛旅程。《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记载：“显见众僧威仪未备……慨律藏残缺，誓志寻求。”[2]法显大师带回了《摩诃僧祇律》、《萨婆多众钞律》、《杂阿毗昙心论》、《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等梵本，丰富了中国佛教的三藏典籍，尤其是律藏的储备。

3.1.2. 推动义学发展

《方等般泥洹经》是法显大师带回的重要经典之一，其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引发了中国佛教界对涅槃思想的深入探讨。道生大师（355~434）深受此观点启发，进一步提出“一阐提也能成佛”的理论，引发了激烈的争

论，受到“旧学僧党”的攻击，被逐出建康，故而有后来“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经典传说。《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中记载：“法显三藏翻六卷《泥洹经》云‘除一阐提，皆有佛性’，生公云：‘夫禀质二仪，皆是涅槃正因。阐提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盖是此经来未尽耳。’由唱此言，被摈武丘。”[6]虽然道生大师提出的这一观点在当时遭到了非议，但是在后来北凉昙无讖尊者（385~433）译出的《大般涅槃经》等诸多经典中均有记载：“一切众生及一阐提悉有佛性。”[7]其说得到证实。

3.1.3. 规范戒律行持

佛教初传中国时，戒律传译残缺不全，僧尼违犯戒律的现象屡见不鲜。据《高僧传》卷九中记载：“耆域者，天竺人也……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域胡跪晏然，不动容色。时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谓支法渊从牛中来，竺法兴从人中来。又讥诸众僧，谓衣服华丽，不应素法。”[8]《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一中记载：“太兴尝有疾，沙门昙鸾为其祈福，病愈。后有沙门乞食，太兴戏之曰：‘斋食既尽，唯有酒肉。’沙门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双，食尽犹言不饱。”[9]被称为“佛教三武一宗之厄”[1]中的第一厄——北魏太武帝灭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当时佛教内部戒律松弛，僧尼行为失范有直接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尼违戒研究》一文中：“作者从僧尼从事农商活动、饮酒、淫乱、衣着华丽、偷盗、妄语，及参与军队活动七个方面进行了叙述，将这一历史时期下僧尼违犯戒律的现象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同时指出了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分别是：社会环境、僧团庞大良莠不齐、戒坛不兴，和戒律自身原因；并进一步强调说明了求取戒律、翻译戒律、令僧尼有戒律可持守的重要性。”[10]。

法显大师西行求法带回了《摩诃僧祇律》、《萨婆多众钞律》、《弥沙塞五分律》三部律藏典籍。于416年开始，与佛陀跋陀罗尊者共同翻译了《摩诃僧祇律》。《摩诃僧祇律》是佛教大众部（摩诃僧祇部）的律典，内容丰富，包含了戒律分类、僧团制度、比丘戒法和比丘尼戒法，为僧众提供了具体的行为规范。律中引用了大量与制戒因缘相关的本生故事。与其他部派的律典相比，《摩诃僧祇律》更加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大乘的理念。其对菩萨行的强调，使得这部律典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中具有独特地位，也更符合中国佛教信众对大乘教义的接受和追求。

3.1.4. 促进宗派形成

法显大师带回并翻译的《大般泥洹经》六卷本，与北凉昙无讖所译的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经》南北呼应，共同为涅槃学派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观点，对后世诸多宗派的佛性理论产生深远影响。天台宗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性具善恶”思想，认为众生不仅具有善性，也具有恶性，两者本具于佛性之中。这一观点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佛教界对心性本质的认知。此外，法显大师译介的《杂阿毗昙心论》使得毗昙学在南北朝时期迅速兴起，其中“五位七十五法”体系，为后来唯识学的东传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3.1.5. 融合本土文化

《大般泥洹经》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无差别”[11]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观念相契合。如《归元直指集》中说：“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云：涂之人可以为禹。常不轻菩萨云：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是人人可以为圣贤，人人可以作佛西方净土。”[12]此外，佛教的慈悲观念与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融。这种契合性，既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使得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1.6. 增进文化交流

在佛教文化传播上，法显大师功绩卓著。在宗教研究方面，法显大师对各地佛教圣迹、宗派分布及宗教活动的记录，为研究佛教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从文化交流的宏观角度看，《佛国记》这部著作意义非凡。它详细记载了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宗教、社会、经济等多方面情况，为研究古代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宗教和中外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法显大师的西行之路还是促进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重要纽带。他往返于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既向外传播展示了中国僧人的文化自信，同时又将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文化带回中国，推动了佛教中国化发展进程。

3.2. 间接影响

3.2.1. 启发后世僧侣西行求法热潮

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壮举为后世僧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发了他们西行求法的热情，其中唐代玄奘大师最为著名。玄奘大师深受法显大师事迹的鼓舞，为了寻求更完备、准确的佛教经典，于贞观元年（627）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之路。玄奘大师的西行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超过了法显大师。他带回的经论数量众多，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翻译的经典，如《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等，在翻译质量和学术价值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他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详细记录了他在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包括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成为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历史和文化的文献。

3.2.2. 促进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普及

南海，这片广袤而深邃的海域，不仅是连接中外的重要通道，更是一部沉淀着千年记忆的厚重史书。自古以来，南海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海上交通与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数商船从这里扬帆起航，驶向世界各地，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精美商品传播到海外，同时也带回了异域

的珍宝与文化,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然而,这片承载着繁荣与希望的海域,也暗藏着无数的危险与挑战,海难的阴影始终如影随形。

面对频繁发生的海难,人们在积极探索航海技术改进的同时,也将内心的希望与寄托转向了神灵的庇佑。观音和妈祖,作为人们心中慈悲与守护的象征,逐渐成为了南海地区航海者们顶礼供奉祈祷皈依的对境。《妙法莲华经》中说:“……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起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鬼难。”[13]《华严经》中,观世音菩萨对善财童子说道:“若能至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若能至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14]从古至今,危难之时凭借祈祷忆念观音菩萨得以救护,离苦得乐的公案和传说不胜枚举。

法显大师作为汉地僧人西行取经的先驱者,晋义熙七年(411年),从师子国东归,次年四月在今印尼一带的古“耶婆提国”(梵文Yava-dvipa,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搭乘商船经南海回国。据《高僧法显传》记载,在海上航行期间,法显大师一行遭遇了极为恶劣的天气。“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神佑。”[3]当时的海面狂风呼啸,巨浪滔天,商船在汹涌的波涛中剧烈摇晃,仿佛随时都可能被大海吞没。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法显大师凭借着坚定的信仰,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及归命汉地众僧,祈求庇佑,最终得以安全抵达。法显大师的这次经历不仅是他个人求法历程中的一次奇迹,更是南海观音信仰在历史上的一次生动见证。

3.2.3. 促进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

(1) 佛教故事

法显大师在《佛国记》中详细记录了南亚佛教圣地的相关传说。比如:佛陀“燃灯佛授记”的故事,他在那揭国(梵文Nagarahara,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市)记录了释迦牟尼佛前世以金币购买五朵鲜花供养燃灯佛的传说,并考证当地为了纪念此事建造的佛塔,成为后世佛教徒朝圣的重要依据。

这些故事也在不同程度上启发和帮助了佛教在进行中国化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向着本土化、民间化、生活化方向发展,以一种通俗易懂且富有吸引力的方式深入民间。在内容上,传播者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念融入佛教故事中。比如:“目连救母”[15]的故事,在印度佛教原典中,主要为了强调因果报及供僧功德。但在中国民间传播时,则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将之升华为孝道的典范,使其更符合中国民众的道德认知和情感需求。

在表现形式上,佛教故事的本土化传播借助了多种民间艺术形式。在一些地方戏曲中,都有以佛教故事为蓝本改编的剧目。比如,脍炙人口的豫剧《妙善救父》和越剧《观音得道》等,深受广大信众喜欢。还有说唱艺术,比如,苏州评弹《目连救母》、河南坠子《观音出家》、四川竹琴《达摩祖师》等,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佛教这种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让广大的普通民众也能轻松理解佛教故事的内涵,从而使得佛教信仰在民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2) 节日习俗

法显大师的西行求法间接的推动了中国佛教节日与习俗的形成和发展。《佛国记》中描述了佛顶骨、佛齿、佛锡杖等圣物的供养仪式,比如:佛顶骨在特定节日被公开瞻仰,国王与民众共同参与献花、燃香等仪式。这些宝贵的记录不仅保存了佛教史记,还推动了相关圣物崇拜习俗的传播。这对佛教中国化的演变亦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唐朝皇室每三十年一次的“开启地宫,迎请佛骨”供奉活动,自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开启法门寺塔基,敕准开示佛指骨舍利开始,相继共有唐高宗李治(628~683)、女皇武则天(624~705)、唐肃宗李亨(711~762)、唐德宗李适(742~805)、唐宪宗李纯(778~820)、唐懿宗李漼(833~873)六位皇帝将佛指舍利迎入宫中,隆重供奉。

浴佛节也是其中之一,据《过去现在因果经》等记载:“于二月初八日出生时……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身黄金色有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亦于空中作天伎乐,歌呗赞颂,烧众名香,散诸妙花,又雨天衣及以璎珞,缤纷乱坠不可称数。”[16]受此影响,中国佛教信众逐渐形成了在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举行浴佛仪式的习俗。人们用香水灌洗佛像,以纪念佛陀的诞生,表达对佛陀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习俗方面,比如:印度佛教的“六斋日”(每月8日、14日、15日、23日、29日、30日),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吃斋”习俗。在一些特定的日子,信众会选择吃素,不仅表达对佛教戒律的遵守,也蕴含了祈求平安、慈悲修福的美好愿望,比如:“朔望定斋”、“年节吃素”、“观音斋”、“本命斋”等等。

(3) 佛教艺术

雕塑艺术领域,早期的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积极吸收印度犍陀罗(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艺术与笈多艺术风格。犍陀罗艺术沿着陆路丝绸之路,途径西域,北魏时期传入中国,距佛教传入中国已有400年。在中国的佛教艺术中,无论是寺庙,还是石窟,都深受其风格影响。新疆的龟兹石窟和甘肃敦煌石窟这种特征尤为明显。直到北魏龙门石窟的审美变化,开始确立了中原样式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宣告了犍陀罗样式的汉化终结。西魏时期的菩萨相貌具有南朝士大夫的气质,面相清瘦,身体修长,眉目舒朗,姿态飘逸,身着长袍,宛若仙人。到了北周时期开始,佛像面容逐渐趋向圆润丰满,呈现出温和、慈祥的气质;姿态上,更加自然亲切;服饰方面,融入中国传统服饰元素;线条运用上,愈发流畅自如;题材选择上,大量融入中国本土元素。这些转变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国民众对于佛教绘画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佛教建筑领域,法显大师记录的南亚佛塔形制,比如:七宝塔、精舍结构等,同样的影响了中国的佛塔建筑风格。印度的佛教建筑以窣堵坡(梵文Stupa,塔)、毗柯罗(梵文Vihara,僧房)、支提窟(梵文Caitya,佛殿)三种形式为主要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与宗教特色。这几种建筑形式,随着佛教的东传一并进入我国,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佛塔、寺院、塔庙窟。自南北朝时期开始,中国的佛教寺庙在布局上逐渐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以中轴线为核心,对称分布主要建筑。在建筑结构上,大量运用中国传统的木结构体系,斗拱、飞檐等建筑构件的使用。同时,在建

筑装饰方面，融入了中国传统的雕刻、彩绘等艺术形式。这种中国化的佛教建筑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3.2.4. 对中国文化佛教文学的影响

（1）对中国哲学的渗透

在主体论方面，佛教的“空”、“心性”等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气”等观念相互交融，既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核心脉络，同时也是“超越性本体”与“内在性伦理”的一场对话。以魏晋玄学为例，当时的玄学思潮与佛教般若学相互影响，玄学家们借用佛教的思辨方式来探讨宇宙本体和人生意义，而佛教般若学的“空观”也在与玄学的交流中，被赋予了更具中国特色的内涵。到了宋明理学时期，佛教的“心性论”对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程朱理学中的“天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佛教对心性本体的探讨，将儒家的道德伦理与形而上的本体相结合，也即“三纲五常”；陆王心学的“心即理”思想，更是与佛教的“心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强调通过内心的反省来实现道德的完善和对真理的领悟，完成“内在超越”的哲学构建。

（2）对佛教文学的贡献

《佛国记》作为中国第一部海外游记，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法显大师之前，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到海外的经历和见闻。《佛国记》的出现，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它开创了传记体文学的先河，以简洁朴实的叙事风格，生动地记录了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艰辛历程和他在海外的所见所闻。《佛国记》不仅具有地理价值、历史价值、宗教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后期，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法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佛国记》的写作风格和内容结构。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海外游记文学的宝库，为后人了解古代世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4. 结论

法显大师在东晋十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65岁高龄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历时14年，行程数万里，其壮举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宗教层面来看，法显大师带回并翻译的大量经律，填补了中国佛教三藏典籍的诸多空白；为佛教义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规范了僧团戒律；并且对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在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法显大师贡献卓越。他的《佛国记》记录了丰富的异域信息，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成为研究古代亚洲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其西行经历还推动了多元文化融合，为中国佛教发展注入多元元素。此外，法显大师还对佛教故事、节日习俗、艺术形式等方面的本土化演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间接影响，使佛教信仰深入民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领域，《佛国记》开创传记体文学先河，对后世海外游记文学影响深远；在哲学层面，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交融。

尽管当前教界和学界对法显大师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可拓展空间。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视角，深入探究其对古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作用以及在文化传承演变中的角色；加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综合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资源；同时，积极挖掘新资料，如出土文物、地方史志等，从而更全面、深入地揭示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为理解佛教中国化进程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让法显大师的伟大精神和卓越贡献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 [1] 黄忏华. 中国佛教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8:5-8,45-47.
- [2] 僧祐. 出三藏记集·法显法师传[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55册 no.2145.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111c14-15,111c17-18,11c25-12a14,111c12.
- [3] 法显. 高僧法显传[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51册 no.2085.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865c28-866a5,865a1-2,860b29-c4,866a17-20.
- [4] 孙文川, 陈作霖. 南朝佛寺志[M]//CBETA电子佛典集成: GA002 no.5. 2024:2a5-6.
- [5]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21.
- [6] 澄观.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36册 no.1736.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59b23-27.
- [7] 昙无讖. 大般涅槃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12册 no.374.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549a12-13.
- [8] 慧皎. 高僧传[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50册 no.2059.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388a27-28.
- [9] 陈梦雷, 蒋廷锡. 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M]//CBETA电子佛典集成: X77 no.1521. 2024:11b5-8//R133:313b9-12//Z 2B:6:157b9-12.
- [10] 杨月红. 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尼违戒研究[D].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19. DOI:10.27287/d.cnki.gsxsu.2019.00806.
- [11] 法显. 佛说大般泥洹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12册 no.376.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895b2-3.
- [12] 宗本. 归元直指集[M]//CBETA电子佛典集成: X61 no.1156. 2024:468c21-22//R108:312b11-12//Z 2:13:156d11-12.
- [13] 鸠摩罗什. 妙法莲华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9册 no.262.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56c12-15.
- [14] 般若. 大方广佛华严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10册 no.293.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734a15-17.
- [15] 竺法护. 佛说盂兰盆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16册 no.685.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779b25-c3.
- [16] 求那跋陀罗. 过去现在因果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3册 no.189. CBETA电子佛典集成, 2024:625a28-b6.

